

军人叙事与英雄赞歌

——关于长篇军旅小说《我的喜马拉雅》的笔谈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张志强：《我的喜马拉雅》（花城出版社2022年12月）是傅逸尘策划主编的“新高地军旅文学丛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第二辑的首部长篇小说。作品以独特而新颖的手法描写西藏解放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进藏官兵英勇、感人的生平经历，引起读者关注。作者石钟山用作品阐释了“新宏大叙事”的独特魅力，也使得当代“军人小说”叙事焕发出耀眼光芒。

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18军从召令发布到组建3万人的进藏部队，红旗漫卷、千里跃进的磅礴场面。作品似一幅冷峻壮阔的重彩画，将一幅宏大而震撼的大进军、大牺牲的史诗画面展现出来。

作品所描写的18军遭遇的困难与阻碍是难以想象的。一方面，军队面临着藏兵偷袭、匪患肆虐。另一方面，高原缺氧、极端寒冷的恶劣自然环境和严重的食物缺乏使得进藏部队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生命处处受到威胁，死亡随时发生。前卫团官兵在修完桥后遭到国民党残余兵力突袭，三个战士牺牲，鲁排长重伤。为了不补给部队拖后腿，鲁排长爬到桥边坠到河里。政委杨明业在修路时牺牲……一个个壮烈场面的描写，展现出震撼人心的英雄图谱。英雄牺牲的崇高形象，战友情深的光芒荣耀，官兵豪迈激情的生动呈现，让阅读变成一次血脉奔涌的精神沐浴。

小说是通过前卫团英雄群体的视角叙述这场壮观的进藏场面的。这些人物的曲折坎坷的故事，描绘出这支部队英勇顽强、忠诚使命的精神底色。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前卫团团长顾红旗和政委杨明业。18军的许多军人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响应国家号召转业到了地方。三团团长顾红旗甚至在地方公安局副局长的岗位上已经干出了一些名堂，准备成家立业了。但突然接到让他立即重返部队、进军西藏的召令，他马上放下眼前刚刚开始的一切。军人的天性就是服从，在光明前路已经显现、和平生活已经展开时，他立即放弃了现有，复归军旅。

在“留守处”扫尾的三团政委杨明业，也在盼望着工作早日结束，到地方重新开始与连年征战不一样的和平生活。此时，他接到了重组三团建制、率部西进的命令。然而，进藏是要上世界上海拔

最高的高原，面临着艰难复杂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环境。杨明业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最小的才出生不久，最大的不过3岁而已。他所面临的选择最为艰难，但他依旧毅然决定重回战斗岗位。

石钟山把这样一部进军西藏的英雄史诗写得跌宕起伏，慷慨悲壮。与他以往作品不同的是，他以正面叙述大军进藏的壮阔场面作为主轴，用诗歌式的语言、颂歌体的叙事姿态，描写危机重重的战争场面和严酷凛冽的雪山高原，以及当时复杂多变的藏区社会环境，创造出了波澜起伏、凝重开阔的宏大叙事。

《我的喜马拉雅》不仅写了“大”，也写了“小”：写了国家情怀、民族意志，更写了军人的友情、爱情、亲情；写了忧国忧民的大情怀，也写了犹豫徘徊、踌躇迟疑、痛苦挣扎等个人情感，在军人的职业光环之外，呈现出人性的温度。

在描写个人情感上，作家表现出了一贯的娴熟与自然。顾红旗与政委杨明业、马师长的生死友谊；顾红旗为了给战友报仇，违抗军令追杀匪军，却迷失在复杂的山间；马师长为他担心焦虑，几天后侥幸回到大部队中来的顾红旗被降职为运输连连长，后又重新启用；桑杰曲巴一家与冷妮、顾红旗的关系，以及三代进藏军人间的联姻与承续等情节，都写得情切意浓，感天动地。

写军人职业、军人情感是作家石钟山自登上文坛之后就一往直前的创作阵地。《我的喜马拉雅》与石钟山以往习惯将战争、战场和军队生活作为故事背景，进而叙述军人的情感世界不同；他将战场与情感世界融合起来，既写军人的友情、爱情、家庭生活，又写军事行动、战斗场面、自然环境，这使他的创作不仅与其他作家区别开来，也与他过去的作品有了明显的差异。

石钟山在《我的喜马拉雅》中把“个体叙事”和“宏大叙事”相融合，创造性地完成了近年一直在呼唤的“宏大叙事回归”的命题，使新的宏大叙事与以往宏大叙事完全迥异的形式出现了。

宏大叙事的精神追求，是服从集体意志，牺牲奉献，具有“崇高”的光泽与正能量的涌动。而个体叙事遵循的是命运与情感的逻辑，直面的个体生命，重点是“人”，人的内心、人的情感。石钟山在《我的喜马拉雅》中“借”战争背景、英雄群像，通过个体叙事复活了全新的宏大叙事。

石钟山激情澎湃的新宏大叙事《我的喜马拉雅》的出现，刷新了人们对石

钟山军人小说的一贯印象：从专注于军人情感世界，拓展到了军人的战争生活；从个体叙事融合到了宏大叙事。《我的喜马拉雅》是石钟山军人叙事的一次重要突围。

在人物描写上，石钟山也进行了新的尝试。《我的喜马拉雅》既描写旧政权的反动者形象，也描写当时藏族上层的人物，更表现了藏族普通人形象，如格桑顿珠、格桑玉麦、梅朵卓嘎等。特别是作者给主要人物顾红旗配写的桑杰曲巴这个人物，虽然出场次数有限，却生动感人。这个人物既是顾红旗结交的第一个藏族朋友，也是这部小说中形象鲜明、讲义气重感情的高原好汉。

《我的喜马拉雅》展现出石钟山文学创作的新特点、新突破，期待作家未来有更多的“不同”与创新。

石钟山：70多年前，18军肩负着神圣使命开进了西藏，这是我多年前就了解的历史。两年前一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西藏，走进了西藏军区军史馆，被18军的故事深深震撼了。从史料到健在的当年18军的老人，包括对他们的子女们进行深入采访时，仿佛时空穿越了，把我带到了当年。漫天飞雪，高寒缺氧，人喊马嘶的场面一次又一次映入我的眼帘。这样的情形，让我一遍又一遍眼眶湿润。

要想写18军必然要写到现在，当代军人守边戍边，默默无闻，同样是牺牲和奉献。当年一穷二白，推翻封建农奴制度的新西藏又变成什么样了，都是我思量要表达的内容。首先摆在我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小说的结构。在小说中，我写了从解放之初到现在，三代进藏军人的牺牲、成长和奉献。

第一代军人解放西藏，进入西藏，并且还要站稳脚跟，结束过去有边无防的历史；第二代军人是边关高原的守护者和建设西藏的主力军；第三代军人是逐步成长起来的新时代军人。三代军人因时代不同，肩负的使命也不同。文学创作的最大忌讳就是偷换主人公，使得作品的情感线断了。思量再三，我还是选择以传统的家庭为单位来结构这部小说。于是，小说中就有了两个家庭的故事，顾红旗、冷妮、杨明业、王秀丽，以及他们的下一代，大康、三康，藏光、藏南，一直到第三代扎根西藏戍边的当代军人。

当然，这样创作不是凭空想象而来的。在我采访过程中，西藏的军人家庭在西藏有很多；父母同时西藏退休了，他们的子女又前赴后继地走进了西藏。第二

代军人早已退休，回到了内地，他们的眼神和话语中仍然保留了只有他们明白的西藏符号。直到现在，他们三五成群地每年还要进藏一次，似乎只有这样，才会让他们的生命、思念平息下来。他们经常随口说，这就是他们的宿命。

是宿命也是使命，他们的根已和高原紧紧连在了一起，血肉相连无法分割了。他们对西藏边关哨所的感情，就像是自己的家人，一生一世的老友，每每聊起来都眼神闪亮。

我在创作《我的喜马拉雅》这部小说时，几易其稿，不仅要从史料中不断地跳出来，还要兼顾到当代人的审美。我经常被三代军人做出的选择而震撼、感动。西藏的高原之所以神秘和令人向往，是因为我们常人难以到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边防官兵要常年驻守于此，面对冷风朔雪，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巡逻站岗。这种牺牲不是我们常人能够想象得到的。就是这些官兵，沿着当年18军进藏的足迹，前赴后继地走上高原，默默地牺牲奉献着。

在我采访的西藏军人中，他们言谈间很少说到“信仰”二字，但我知道，信仰深深地镌刻在他们骨子里。西藏就是他们的故乡，有他们的青春、爱情以及生生死死的艰苦岁月……

走进当代军营，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口号“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这就是我们的高原军人，牺牲奉献着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守护着和平与脚下的每寸疆土。创作《我的喜马拉雅》这部小说，是向18军当年的官兵致敬，也是向当代戍边的将士致敬。唯有此，才能表达一个老兵对高原军人的敬意！



长征

第5723期

岁月探微书心迹

■卫如珍

更猛烈。

作者以动人笔触呈现了艰苦岁月中的往事带给父亲的心理影响和其中昭示的人性光辉。父亲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英雄，是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的战士，也是为人朴实诚恳、很少夸耀自己的普通人。但是，他却因那些法币而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作者在《散落在1945年秋天的法币》中三次记述有关“散落的法币”：第一次是作者小学二年级时，奶奶从冀中平原来到太原，对父亲说起幸亏那一年有了那些钱，要不然全家人都得饿死，而父亲却叹着气，不让再说起那些钱。父亲这件事不愿让人提及的往事，在作家心里留下了印记，警醒其要严以律己。第二次是作者中学休学，准备入伍。此时，作者追求的是上战场杀敌报国，关心的是父辈英勇抗战的精神。第三次已是20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全国开始征集党史资料，号召老同志回忆录时，父亲却长叹“我犯过错误啊”。这一声叹息便是父亲的言传身教，润物无声地融入作者的生命中。

《散落在1945年秋天的法币》诚实地叙述出那段故事，讴歌了革命前辈与人民群众的牺牲奉献。作者将笔触伸向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与故事，借由那些散落的法币，巧妙地描绘出那一代人的质朴、善良品性和自律自省。李金明散文的书写，将重心聚焦到人物的命运，使读者在人物不平凡的人生轨迹和矛盾心理中感悟革命胜利的不易，展现特定历史条件下那一代人的生存状况与心灵品质；同时，以坚实的历史铺垫和清晰的细节刻画描摹出一幅闪耀着精神光辉的感人画卷。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新世纪以来，战争小说与影视在我国军事文艺百花园中展现出亮丽的景观。世纪之交，描写革命战争的《历史的天空》《亮剑》等长篇军旅小说集中出版，并在2005年前后拍摄成影视作品。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大决战》《跨过鸭绿江》《长津湖》等多部战争题材影视作品集中上映。新世纪以来，众多战争文学与影视精品佳作相继问世，二者交相辉映，呈现战争题材文艺的新风貌。

总体来看，新世纪以来，战争文学与影视的出版和传播呈现出较为稳定的规律和特点。首先，党和国家的重大主题宣传、历史节点，成为此类作品多体裁、多媒介竞显身手的助推剂。其次，从创作题材来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仍是战争题材作品着力呈现的题材。第三，多元主体的力量施展，助推战争题材作品的推广传播。

从文本特征上来看，新世纪以来的不少战争文学与影视作品，显示出大胆创新、内外延伸又未免于模式化的趋势。概括言之如下。

其一，标定新的革命年代军人形象塑造方向。军旅作家徐贵祥在《历史的天空》塑造了来自社会底层、身为草莽、形貌不佳的梁大牙，但对爱情的愿望和抗日志向让他成为信仰坚定的英雄。从《历史的天空》到后来的《八月桂花遍地开》《高地》再到2021年出版的《英雄山》，徐贵祥始终是战争和战场的直面叙述者。他很少迂回、侧写战争，多直面描写硝烟弥漫的战场和在战争熔炉中锻造的人物。徐贵祥写的是“纯正”的战争小说，生动地塑造人物而又着意创新。梁大牙的“另类”形象，与《亮剑》主人公李云龙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不同，《亮剑》着重表现李云龙头脑灵活、作战勇敢、不畏对手，刻画革命英雄的命运起伏；电视剧中着重表现了敢于“亮剑”的战斗精神，刻画原著中的人物塑造和战争美学。这种对英雄的呈现，回归到了人的复杂性，让不完美的普通人成长为英雄，焕发出英雄主义光彩，贴近了历史真实。然而，这种“不完美的英雄”很快又成了新世纪以来不少战争题材作品的“标配”；此后，又因为诸多作品批量式袭袭这一风格而陷入模式化、脸谱化。

影视作品《大决战》《跨过鸭绿江》的出现别具意味。它们是高扬红色传统的恢弘史诗，让人看到革命现实主义叙事的回归。小说方面的创新突破，当以徐怀中的《牵风记》为代表，其空灵雄奇而又血色浪漫的风格，创新了战争文学的表达；朱秀海《远去的白马》突出了民间传统一诺千金、孝道和宽容、牺牲与感恩等朴素道义。它们给新世纪的战争题材作品重新引入了古典之美。

其二，拓展表现新的军人形象。《突出重围》在世纪之交首播，将和平年代的实兵对抗演习引入作品，对新世纪的战争题材文学与影视影响深远。随后出现的《我是特种兵》《士兵突击》等作品对当代军人形象的塑造、展现出的新气象，都延续了这一脉络。《我是特种兵》从2011年开始，至今已出过5个系列，展现了特种兵的成长历程和在军旅释放的青春能量，深受“网络原生代”的欢迎。

兰晓龙在《士兵突击》中塑造的许三多，经过部队生活考验和意志锻造，最终成为优秀的军人。“特种兵”长期以来是网络军旅文学作家倾心的主题之一。作品中浓烈的情感、探险般的故事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是这些作品中的共同元素，吸引着众多读者关注。但“特种兵”小说最初带来的新鲜感也随

墨韵光影展烽烟

略论新世纪以来战争题材小说和影视的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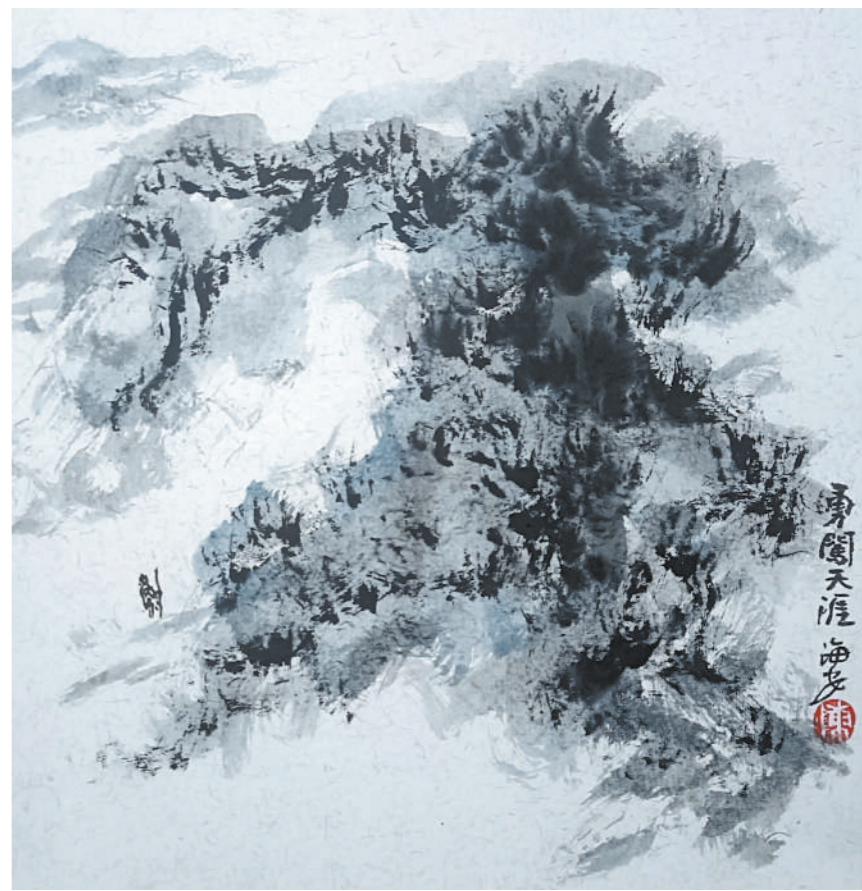
■李红强

其叙事的模式化而逐渐消退。《战狼》中的人物塑造接续《突出重围》的风格类型，结合《士兵突击》的质朴韧性，塑造出兼顾主流价值和个性鲜明的军人形象。

第三，开辟战争文学表现的新战场。新世纪战争文学不仅描写战场上的冲锋与牺牲，也描写情报与秘密战线上的斗争。谍战作品天然唤起人们对隐秘的兴趣，现代谍战作品又融信仰与阴谋、真实与伪装、平静与惊悚于一体，综合了多种刺激人们神经兴奋的因素。2003年出版的《暗算》，表现特殊战线上的战士们沉默无声的信仰和牺牲。此后，谍战主题文学和影视作品更成气候，涌现出《潜伏》《悬崖》《黎明之前》《北平无战事》《乌江引》《千里江山图》等。

新世纪以来，谍战作品涉及的领域之多、程度之深，值得关注。《风筝》《前行者》写上海租界的间谍暗战，《悬崖之上》则面向共产国际特工等。不仅题材四面开花，谍战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深度也在进步。刘和平的《北平无战事》中，写作的重心不再只是情报斗争，而是在更广阔的经济、金融、知识界等层面上，让谍战与社会历史转型同步展开，为谍战引入了厚实宏大的历史整体观。《乌江引》以小说的形式，将长征中的“密电破译”展示出来。《对手》的出现同样给人惊喜，谍战开始融入普通人的生活，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与现实质感。

新世纪以来的战争小说和影视作品在多方面取得突破。影视作品的人文性和技术美学融合度越来越高。小说类作品，写实性写作与军旅出身的成熟作家、类型写作与网络青年作家，似乎各安其位，渐成分野之势。未来，期盼更多尘封的档案与史料得到深挖，出现如王树增《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饱满厚重的非虚构作品；期待加强对战争本身、生命个体的探讨与传统叙事中的悲壮苍凉、壮阔优美风格的展现。



勇闯天涯(中国画)

陈海安作

深情著文颂热土

■余添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红安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众多共和国将军诞生于此。红安也是军事文学创作的富矿之地。面对丰沃的创作土壤，写什么、怎么写，通常会让作家难以取舍。对于小说创作而言，历史往往是作为时代背景出现，讲述动人心魄的故事，展现人物独特的命运，显现着作家的见地。

作为从红安走出来的军旅作家，李骏怀着深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书写发生在那些热土上的故事。

在10篇小说集结而成的《红安往事》（解放军出版社2022年7月）中，李骏将着力点放在那些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因种种原因离开了队伍，又回到故乡的人物身上；塑造了一个个在革命年代有着特殊经历的普通人的鲜活形象。如《英雄血》中的外公，一家十口参加长征，牺牲的牺牲，走散的走散，外公

一路讨饭才回到了家乡；一辈子过着平淡又艰辛的生活，成为一个爱哭的老人，直到去世。《寻找党证》中的六大爷，他读过几年私塾，不会种田，好“酸水假醋”，成为了“本寨庄最不受欢迎的人”；这也就罢了，他还说自己曾是地下交通员，194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他既没有人党证，也没有人能证明，因为当年介绍他人党的同志和交通站的同志都牺牲了。直到六大爷死后，人们在祠堂旁的一个黑色瓦罐找到了当年的党员名单，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英雄表》中的表哥，在北大荒当兵，家人和亲朋都为他感到骄傲；直到有一天得知他牺牲了，才明白他是在北大荒种田，因在中午打农药时中毒而死。关于表哥算不算英雄的问题，不仅在他原连队有讨论，家乡也有质疑声。最终，表哥被评为烈士，追记了三等功；并且通过部队班长和家乡教书先生之口说出“表哥是英雄”“这样不是英雄，那谁是英雄”，完成了对“英雄”的确认。

李骏的创作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和色彩，《红安往事》中的篇章叙事，几乎都是采用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者，“我”具有强烈的在场感，小说主人公也多以“我”的亲人或乡邻身份出现，像外公、表哥、舅姥爷、表姐、六爹、六大爷、五叔等。这使得虚构作品有了非虚构的质感，增强了叙事的可信度。

李骏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擅于打破时空叙述，语言描写仿佛是他手中放出的风筝，时而神游天际，时而近在眼前。看似信马由缰的文字，却总能直击心灵。如《英雄血》开头，“外公总谈起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时，眼泪总是忍不住掉下来。”接着便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地写长征时的外公一家人，写现实中的外公，行文完全是由“我”来主导，故事可以是我对外公的了解，可以是我听外公所讲，也可以是直接描绘再现当时场景。

《红安往事》中每个人物都有令人感叹不已的命运，每个故事都饱含打动人心力量。红安曾是一片鲜血染红的土地。书写它的过往，是革命历史叙事的缅怀，也是时代叙事的砥砺奋进。